

思考着是美丽的(代序)

刘魁立

节日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题目，前两届东岳论坛我们侧重从时间范畴的视角对节日进行研究，这一次转向空间范畴的视角。一般说来，社会正常有序的前进，依靠的是公共性，没有公共性，一个社会的有序的运行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节日对于我们大家就特别重要，它不仅是公共性的非常重要的构成因素，同时对公共性的促进也是卓有成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就十分重要了。

过去我们对于文化空间的研究也许是不够的，这是一个新的词汇，但是应该说，节日的文化空间对于我们并不陌生。这一次会议我们大家不仅针对节日的各种表现形式，同时还从节日的总体结构、社会功能和深层内涵方面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更加深入的研究。

节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生活方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群体来说，节日对于社会的正常有序的运行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体系和当前由行政部门确定的法定假日体系之间多少有一些抵牾。在我国现有法定假日体系里面，除了春节有相当的位置之外，几乎其他的重要民族传统节日比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几乎都没有安排休假。也就是说，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被国家时间制度所认同。这里就出现了一些我们自己能够强烈感觉到的遗憾。我们在不断努力、想方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同时也要很好地研究如何提升民族传统节日在我们的观念中、在我们的生活进程中进而在整个国家时间制度中的重要位置。这样丰富的中国传统节日体系，究竟对于我们社会能起什么作用呢？应该说它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操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生存环境里的幸福感落到实处。如果没有节日，那么我



们的幸福感或者说是与现实生活的满足感就会减少了很多。此外，我们还非常明显、非常深刻地体会到，几乎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部分都会体现在节日当中，而节日是整个民族展现艺术才能的一个集中的环境和时段。节日是一个非常广泛而且非常有色彩的文化领域，无论是社会各界，还是行政领导部门，都应该特别关注，给予特别的位置。

整个社会群体的节假日是我们的公共时间，如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资源。传统节日作为公共时间资源没有被很好的利用，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些资源是白白浪费掉了，如果把传统节日当作公共时间资源加以利用，这些节日就对社会运行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把这些潜力发掘出来，显然就会使民众心中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的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和内心的幸福感落到实处。

在会议的讨论中，吕微和王霄冰曾经征引过尼采，还征引了康德，讲到在我们认识世界的整个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我感觉到，我们面对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认识方法、认识角度，没有必要将某一种方法、某一种角度看成是不二法门。

除了求真的所谓科学的视角，另外还有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并不是单纯为了认识对象，而是从对象和我们自己关系的角度来评价事物，这个角度就是“价值论角度”。价值论的角度，对于认识民俗、认识所谓民间文化事象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在这次会上，这一方面谈的少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在我们平时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这一方面关注本身就少了一些，这可能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一个方面。因为节日对于我们来说，它不仅是文化表现形式，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这个情感是民众的情感，但是我们很少谈民众如何看待节日、如何展现自己的内心情感。

讨论节日的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所谓“实践的角度”，所谓经世致用的角度。而这个经世致用的角度，会议谈的似乎略多一些。张勃、王霄冰、李萍，还有谢泳华等几位报告人谈的都是经世致用问题。比如钟宗宪先生谈到节日的设置和对节日功能的认识以及前面谈到的传统节日法定假日化问题，所有的这些都是一种经世致用。

有时候我在想，一次会议成功与否表现在哪里？我觉得有几个必须说

到的标志：

第一，就是许多报告确实有真知灼见，而且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今天有用，同时将来也会引起后人关注。比如说高丙中先生从学理角度对于文化空间进行深入阐释，他的报告对大家会有重要启示。其他许多报告也同样饶有趣味、多有新意的。

第二，会议是否激起了大家的思考，散会之后，大家是否有激情把这项研究继续下去。如果没有热情、没有互相的鼓励，会议就不算成功。我们的会议确实是一次有彼此鼓励和真正激动的会议。

此外我觉得，这次会之所以成功，还表现在我们和国外的学者有了一次非常有益和深入的对话。

巴西的冯塞卡女士谈到如何调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纳入和融入，社会纳入个人，而个人融入社会。俄罗斯学者安特罗波娃追溯了一个外来的化妆舞会从彼得大帝时代一直到今天 21 世纪之间的演化过程，实际上和我们谈完全是同一个题目。德国的克劳斯教授从一个更宏阔的视角对节日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日本佐野贤治先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将会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从地球村的角度出发，我们作为地球村的村民，应该如何看人类的民俗；作为世界“常民”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民间文化。俄罗斯的克里奥斯教授以俄罗斯圣诞节期间的一种封门仪式为例，用二元独立的哲学思考，进行深层结构分析。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在方法论上各有不同。比如刘晓峰同志把统计学的方法，纳入到我们自己现在民俗学研究的领域里。会议中几位学者谈到城乡之间的关系，康丽教授、刘铁梁教授、萧放教授等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的。今天我们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和乡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题目。

今后还会有非常多的题目，等着我们去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可能来确定的。作为一次会议、一个集体，也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是说如何把我们的今天过好；如何让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在我们今天发挥作用；如何让我们的现实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够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可心，更加让我们喜欢。我觉

得这也许是我们民俗学工作者的一种追求。任重而道远，希望在我们大家身上，在各位的身上。

在几天会议当中，我和大家一样，非常非常的用心。这次会议既有内容充实的报告，也有热烈而有益的讨论，同时每个人还在各自心里对讨论的议题进行着思考和对话，就此我想说：“思考着是美丽的”。刘晓峰同志谈到自己的心情，他报告的头一句话说，“我非常的激动”。他还说，这不是一时的激动，15年来他一直为节日的议题而激动，应该说他的激动也感染了大家。他说，节日的分布和节奏是一部非常美妙的乐章。我听到了这部乐章。他的思考是美丽的，听他的思考，同时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也是美丽的。



目录

思考着是美丽的（代序） 刘魁立 / 1

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

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 王霄冰 / 3

蒙古族“那达慕”的变迁 邢 莉 / 16

韩国女性与节日 [韩] 金明子 / 28

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

——关于甘肃省传统乞巧节的调查报告 柯 杨 / 35

民俗节日氛围营造与文化空间存续

——以台湾民俗假日与商业性文化游乐园区为例 钟宗宪 / 49

浅谈大同过年习俗 解育君 / 71

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在节庆

民俗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薛 洁 林盛明 / 84

后贝加尔湖地区老信徒的圣诞节仪式中年轻人

游戏的结构和意义 [俄] 弗拉基米尔·克里奥斯 / 93

文化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

赶集与聚会：再现于乡村生活的两种时间指向 马光亭 / 101

公共政策与文化空间

——以北京的人文奥运建设为例，兼论节假日

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 王少峰 / 116

文化空间中的民俗

——关于东坝商业民俗的田野考察 王诗愉 / 122

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内在节奏特征 刘晓峰 / 129

博物馆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

——北京民俗博物馆的实践诉求 李 萍 / 140

妙峰山——当代北京的公共空间 吴效群 / 148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建构型节日

——以唐玄宗诞节为例 张 勃 / 170

巴西工人阶级的新生儿迎接礼：民间、宗教和国家权威

的接受仪式和合法性的对抗 [巴西] 克劳迪娅·冯赛卡 / 193

从传统到文化工程再到全球“节日化”：

东欧的节日、假日、节宴和仪式 [德] 克劳斯·罗斯 / 202

中国传统节日保护的现实问题

民俗主义视角下春节习俗的“真”与“伪” 叶春生 / 215

文化空间与民俗仪式 李龙吟 / 231

关于赣北厦屋陈村“过年”习俗的考察 陈立立 / 235

黔西长角苗节日文化变迁的两个案例 杨 秀 /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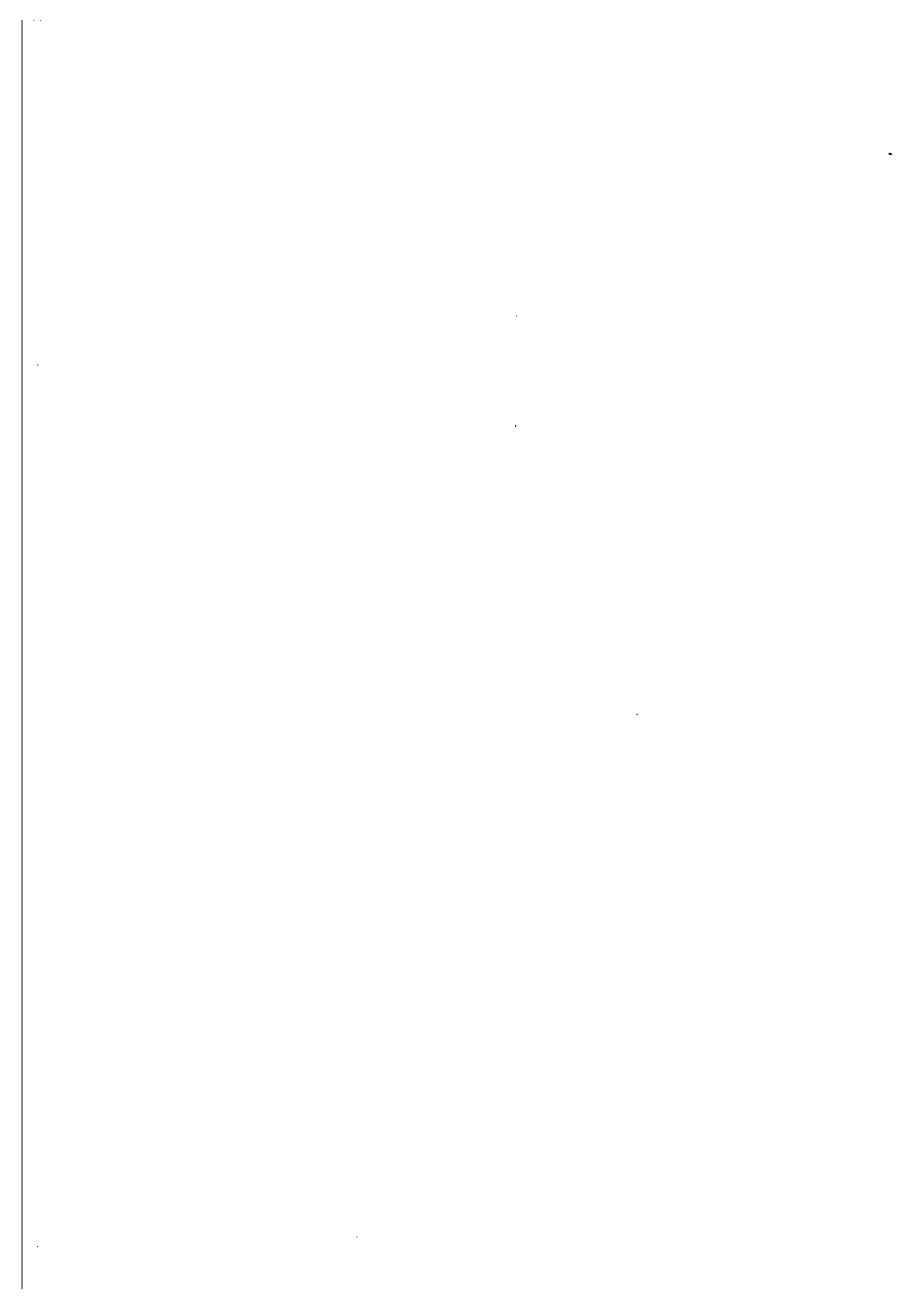
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 黄 涛 / 258

文化空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场域 李彩萍 / 272

民族博物馆：都市中承载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空间 谢沫华 / 282

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

第三届东岳论坛



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¹

王霄冰

现代生活中的节日，从来源和形式上都非常多样，既有从过去保留下来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清明节，也有在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生节日，如国庆节、教师节，还有不少从国外引进的节日，如圣诞节、母亲节。如果我们把节日的概念放得再宽一点，把各种非商业性质的、按照一定节期重复举行的庆祝活动，像传统的庙会和当代的电影节、文化节等，全都计算在内的话，就更是数不胜数。多样复杂的节日体系，为我们研究节日和进行这一领域的学术理论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一方面传统的节日面临淡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人们在面对各种国产的和外来的新型节日面前又常有一种迷失和不知所措之感。²如何理解节日这种特殊的文化空间的本质特征？节庆活动的行为方式有什么规律？节日的公共性和社会价值又体现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于民俗学者和文化学者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给出答案。本文在参考国外一些节日理论以及对中外节庆活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公共节日的一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意在抛砖引玉，与学界同仁就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一、节庆期间的非常状态

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系的《袖珍汉学》杂志在2006年第2期上刊登

-
- 1 本文原稿曾得到施爱东先生和黄涛先生的诚恳批评，对最后成稿很有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 2 这篇文章定稿的日子，正好是2007年2月14日的情人节。很多中国人到了这一天可能都会面临一种困惑：过不过这个节？过的话又怎么过？过节的礼仪规范是什么？过这个节到底有什么意义？等等。



出了一篇文章，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的社会现象。文章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天天过节》。³ 作者在无意中点出了一个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现象，即在“文革”期间，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社会生产和物质文明建设遭到破坏和忽视，造反的红卫兵们天天像过节一样地上街游行、大串联、集会搞批斗。普通百姓都被迫穿上蓝色、绿色或是灰色的制服，早晚聚在一起背诵语录，三天两头地集中起来开会学习和听广播。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全部都被公共化了。红卫兵和民兵们随时都可以闯入私宅抄家。只要上头一声令下，人们不管白天黑夜都要立即奉献出个人的时间，服从组织的需要。即使是以生产物质价值为目的的田间劳动，也必须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先集体学习毛著，仪式完成之后才可以动工。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生活，实质上是否真是“天天过节”，我想留待本文的最后部分再论。但从表面上看，确实像那位德国汉学家说的那样，人们似乎每天都处于节日一般的“非常状态”中。有的德国学者用 *Chrisma* 的概念来形容节日的特殊状态，将它和日常生活对立起来看待。⁴ *Chrisma* 的原意是“神灵附体”，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最早用它来描述与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非常状态，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所谓的领袖魅力，体现在集体行为中就是革命初始阶段的那种群情高涨和骚动。这种带有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的自然冲动经过整合之后，也可以变为正常有序的社会行为，成为机构化的宗教、节日仪式和传统习俗。

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也把节日看成是一种集体的逾制行为。在节日中，人们试图通过大声叫喊、身体的剧烈运动、歌唱和舞蹈等形式来冲破常规。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他写道：“人们会超出自身之外，忘却日常的工作和烦恼。……有很多例子可以证

3 Barbara Mittler: "Alltag als Fest. Mao als Ikone der chinesischen Kulturrevolution (1966 - 1976)", *minima sinica* 2/2006.

4 参见: Winfried Gebhardt: *Fest, Feier und Alltag. über die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 des Menschen und ihre Deutung.* Frankfurt: Peter Lang 1987.

明，民众节日常常会陷入放荡无羁，无视许可与禁止之界限。”⁵这样的超常行为在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看来，恰恰是节日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用哲乃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论⁶来解释节日的“边缘”特征，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在“边缘化”期间的倒置（下降或上升），直至取消群体内部的等级区分，建立无差别的文化共同体。⁷面具、酒精、歌舞和各种竞技活动等，都是在节日活动中帮助进入社会结构倒置状态的常用手段。比如面具，在很多中外节日中都有使用。威尼斯狂欢节的化妆舞会，以神秘的假面闻名于世。我国传统的村傩活动，也大多带着面具举行，并由此产生出了傩戏。在特纳看来，面具的应用，正是为了使参加节日活动的人们的真实身份得到隐蔽，这样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才能抛开平日的地位高低之分，在庆祝活动当中完全融为一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节日的非常状态，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疯狂和热闹。根据哲乃普的理论，在“过渡礼仪”的“边缘礼仪”（即“阈限礼仪”）阶段，往往会有一个集体模拟死亡的时期；此时节日的非常性，就恰恰体现在了静默、斋戒和守候等极度有序的行为当中。比如穆斯林国家的人们在开斋节到来之前的40天都要恪守斋戒，每天天黑之前绝不进食。基督教的信徒称12月24日晚为“平安夜”，这天晚上大家都必须回到自家亲人身边，一起守候到午夜，等到“圣婴降生”之后才会走出家门，涌向教堂庆祝。2007年的元旦，我正好在西班牙的马拉加度假。大约旧年12月31日晚22时左右，我们从宾馆出来，准备到市中心找一家餐馆就餐。⁸到了外面却看到大街小巷全都空空荡荡，杳无人迹。从22点到23点，我们走遍了这座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心部位的所有巷落，发现几乎所有的餐馆酒吧全部关闭，只有两家中餐馆还开着门。而当我们用完晚餐，于午夜零点30

5 Emile Durkheim: Die elementaren Formen des religiösen Lebens. Frankfurt: Suhrkamp 1981. 第514页以下。

6 参见：张举文《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载：《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

7 Victor Turner: Das Ritual. Struktur und Anti-Struktur.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1989.

8 当地人用晚餐的时间通常为晚22点。



分左右再回到市中心广场时，却发现那里突然已是人山人海、烟火满地，人们狂欢乱舞、闹成一片。原来当地人的新年礼仪正像哲乃普所说的“过渡礼仪”那样，先是经过午夜之前的“边缘期”，大家都守候在家中吃年夜饭和守夜。等到零点的钟声响过，才会进入“聚合礼仪”（即“阈限后礼仪”）阶段：人们都从家中蜂拥而出，来到大街上，和无数陌生人一起共同欢庆新年。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光从社会结构倒置这一点来理解节日的非常状态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理清节日（非常）和平日（常）这一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应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在大量实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抽象的分析和概括。目前，国内学界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黄涛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在特定群体的文化观念中，节日时间是区别于平日的‘大日子’”，⁹但节日究竟如何“大”法，他在文中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初步思考之下，笔者认为节日的非常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和观察。

首先，节日是神圣的日子。人类早期的节日，都属于宗教祭祀活动，是奉献给神灵的。即便在节日世俗化之后，其神圣意义也依然得到了保存。所以很多节日都通过集体放假而成为节假日，让人们放下手头的俗务，有足够的时间投身到各种不以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为目的的节日活动当中。如果我们把节日按其行为方式分为狂欢型的（或者套用尼采的讲法而称为“酒神文化类型”）和庄严肃穆型的（即所谓的“太阳神文化类型”）的话，第一种恰如西方国家的狂欢节，第二种则如基督教国家的各种宗教节日。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庆祝期间不仅政府、学校、公司等机关单位关门，而且连商店和餐馆也要放假（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马拉加的除夕夜）。在前者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庆祝，使个人的情感在集体的欢庆活动中得以宣泄；在后者则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有时间去教堂望弥撒和做祈祷，之后和朋友、家人一起散步、聚餐，以沉静和平和的心

9 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情反省思过，以求得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重新融合。

其次，节日的时间是公共的时间，“小我”（个体的我）必须服从“大我”（社会的我）。如果有人在节日期间为了躲开热闹，一个人来到荒郊野外，那就不能算是过节，而只是度假。不过这种情况在当代社会中非常多见，这当然与现代人个性张扬、不屑于与大众为伍的生活态度极有关系。传统社会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发明、创造了大量集体的庆祝方式，比如元宵节的灯会、端午节的赛龙舟，春节正月里的舞龙、舞狮和踩高跷，现代节日中的焰火大会、游园会和联欢会等活动。还有开放式的游行，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庆祝方式。例如德国的狂欢节从每年的11月开始，到2月份的某一天以全民大游行为结束，就连来自各地的观光客都可以随便加入游行队伍。11月份的圣马丁节，主要活动内容也是在这天晚上，一个社区的小孩子们全都提着灯笼，跟随在一个装扮成传说中乐善好施、治病救人的圣人马丁的骑马人后面巡游。

总之，任何节庆活动都必须是由至少两个以上的社会成员共同参加才能成立。一个节日的参与者越多，它的公共性也就越强。节庆活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临时的“庆祝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组织方式既可以是开放的或半开放的，也可以是完全封闭的。封闭式的节日庆祝多在社会团体的内部举行，没有特殊许可，外人不可随便参与。比如很多单位每逢“五一”节和“三八”时，都会举行一些内部的联欢活动。春节的年夜饭，传统上也是一家自己吃，很少有人会在这天闯到别人家里去。开放或半开放式的过节方式则具有较大的公开性，可以允许外人旁观或者直接参与，像民间的歌会、庙会等。这种庆祝方式在传统上往往会选择一个比较宽阔的场所，并且特意安排一些娱乐节目来渲染气氛和带动群众参与。

在当代社会，由于大众媒体传播作用的增强，一个封闭式的庆祝共同体，也可以通过电视直播而转化成为开放式的，比如中央电视台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实际就是一种节日的仪式行为，其意义并不只在于娱乐，而在于促使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能在同样的氛围和感觉下迎接新年的到来，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一个超越时空阻隔的文化共同



体。有时即使是同样一个节日，不同的文化也会以不同的过节方式来构建庆祝共同体。比如情人节，在西方是属于恋人或夫妻两个人的节日，大多采用封闭式的过法。而情人节传到日本，却被改良成了开放式的节日。2月14日这天，日本女性都会买很多小包装的巧克力，送给自己的男性上司、同事、朋友和同学，对他们平日的照顾表示感谢。反过来，男性也会在3月份的某一天，回赠给她们巧克力或其他小礼品，作为情人节的回礼。

最后，节日也是物质消费相当集中的时期。平日勤勉刻苦、省吃俭用的小户人家，到了过节这一天也会倾其所有。富裕人家则更是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德国12月份圣诞节期间商店的销售额，往往相当于全年其他11个月的销售总额，因为在家庭内部和亲友之间，大家都要互赠礼物。日本人过新年（元旦），有合家前往神社祈福的习俗。这一天很多女人都会穿上平时压在箱底的华丽的和服，一套造价一般都在几十万日元，其中特别是未婚少女们的盛装长袖和服，往往价值上百万日元。可见得人们在节日期间的消费观念，与往日完全不同，不像平时那么讲求节约、精打细算，而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奢靡浪费。

二、节庆活动的仪式表演性

作为人类仪式性为的一种，公共节日的活动方式都带有极强的表演性质。人类学家特纳在《戏剧、田野与象征》¹⁰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剧”（Social drama）的概念，来强调仪式的表演性和象征性。把仪式和节庆活动与戏剧表演对比起来进行研究，是以特纳为代表的象征人类学的主要方法之一。他本人的很多专著，在命名时都直接使用了“戏剧”（Theater）或“表演”（Performance）这样的词汇，比如《在戏剧和人类学之间》（Between Theater and Anthropology, 1986）、《从仪式到戏剧：人类表演的严肃性》（From Ritual to Theatre, 1987）和《表演人类学》（The Anthro-

10 Victor Turner: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olology of Performance, 1988) 等。虽然特纳所研究的案例, 大多是一些非洲部族中的宗教仪式和节庆行为, 而不包括结构较为复杂的社会以及当代生活中的各种节日, 但在仪式表演性这一点上, 任何社会、任何形式的节庆活动都是相同的。不仅活动的形式和程序都要事先经过专人的策划和导演, 幕后要有人组织和安排, 而且每个节日都会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化的节目。比如过年, 从进入腊月, 吃腊八粥, 到过小年, 再到除夕夜, 然后从初一到初七, 每天需要干什么、吃什么、甚至在一些特殊的节点上 (譬如在拜年时) 互相应该说些什么, 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

这里我举一个在田野调查时搜集到的例子来说明。2006 年, 笔者在浙江省江山市的礼贤地方调查了当地一年一度的城隍庙会。礼贤由光辉和新建两个行政村组成, 人口共 4100 人, 在唐朝曾做过须江县 (今江山市) 的县城, 至今留下了一座重修于清代的城隍庙殿。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 传说是庙里所供的城隍菩萨的生日, 江山市周围以至毗邻的江西、福建省的百姓们都会在庙日的前后几天陆续前来进香。十五日庙会高潮, 礼贤庙会事前便将城隍爷“沐浴”, 换上新衣新龙袍, 祭拜之后, 热热闹闹地抬到大街、村庄去巡游, 当地人叫“迎菩萨”。据说近几年来庙进香的人越来越多, 庙日这天的游客每次都在万人以上。香客流量的剧增也促使庙会的规模扩大, 需要有人事前进行周密组织, 所以, 去年农历五月初十五日, 原光辉村委会主任、现庙会主任柴贤达 (现年 66 岁) 便召集委员们开筹备会议, 安排接待香客、准备膳食和住宿、组织保安、乐队和化妆游行等工作, 明确分工和职责。

按老例规, 礼贤城隍庙“迎菩萨”的队伍, 应该按照以下顺序巡游:

1. 开道。齐放老佛铙, 吹响“呜——”的先锋长柄喇叭。顿时, 铙声震天, 喇叭嘹亮, 声势相当浩大。

2. 香炉杠。由两人或四人扛着一杠香火萦绕的香炉。

3. 踩高跷队。一般由八名 20 来岁的男青年组成。他们两脚扎着高棍, 化妆成戏剧中不同的人物角色, 组成一台戏。

4. 粗锣鼓乐队。由锣、鼓、钹、镗等四种鼓乐组成敲打, 乐声比较粗放。



5. 迎台阁。共有三至四杠，四人抬一杠。杠上站着身穿彩服的童男童女（五至七岁），也化妆成戏中不同角色，组成一台戏。

6. “老佛轿”队。轿里杠的是除城隍爷之外供奉在庙里的其他菩萨，每尊菩萨各坐一杠轿。

7. 马一匹。披红挂彩，由骑手骑着行进。

8. 护驾的警察。有8、12或16名，全副武装。

9. 彩旗队。数十人手执形状不同、颜色各异的彩旗队伍。

10. 细锣鼓乐队。除粗锣鼓的四种鼓乐外，还有胡琴、笛子、唢呐、板鼓等比较文气的乐器组成吹奏。

11. 由数十名青年组成的民间武装自卫队伍，扛着真刀真铳、长矛和叉等兵器。

12. 十八罗汉（和尚）。由18名十来岁的少年扮演，他们身穿用苧麻编织的麻布衣服，脸上戴着不同角色脸谱的面罩。

13. 锡炉。左右各一只，由俩名村上贡献大、有名望的乡绅提炉。他们头戴礼帽，身穿细麻布衣，用手提着点燃檀香的锡铸香炉行走。

14. 城隍菩萨像。俩人并排抬，其中一人的一手高举城隍菩萨像，另一手拿大印。大印用红黄色绸布包裹，不外露。另一人举“敕书”，即皇帝敕封城隍的圣旨。后面跟随两位捧着点燃檀香托盘的巡行者，意是檀香能解除所到之处的秽气，保证城隍庙菩萨的清洁干净。

15. 城隍爷轿。由四人抬扛。轿上的城隍爷（当地人称“城隍佛”）金脸，戴天官帽，穿龙袍、披风，全新打扮。左手捧朝书，右手摇鹅毛扇。有四名头戴礼帽、身穿麻布长衫的绅士跟随扶轿。

16. 掌扇。两名有名望者分别抬举两把罗汉竹做成的长方形圆角掌扇，扇面上分别写上“张善”和“罚恶”。

17. 跟随的村民和香客。巡迎队伍出发前要演一出上马戏。上马戏由庙会选定短小的精彩剧目。“老佛铳”鸣放后，队伍顺礼贤街自南而北巡游，街上打扫清洁，清除路障，住户们在门前摆祭揖拜。队伍游至姜家祠堂要歇息一次，演一出小戏，然后往邻近的安坂村巡迎。到了安坂村，该村100多户人家全都在广场上摆上“擎盒盆”（祭祀专用的手提红漆圆

盆)，备上丰盛祭品来祭拜。此时广场上祭品满目、香火缭绕，人群沸腾如潮，使活动达到高潮。此番祭拜之后，巡迎队伍按原路返回，全程共约三公里。

以上的程序，主要根据当年的庙事管理者姜贤祥（现年78岁）和礼贤籍退休教师姜洪水（现年80岁）的回忆整理而成。近年来的城隍庙会活动，虽然也按照老规矩进行，但规模和铺张程度远远不如过去。譬如其中的踩高跷队伍，由于缺乏有技术的高手而多被省略。另据老人们回忆，旧俗的城隍庙会期间，从12—18日，庙里天天都有戏班演戏，一天唱一本戏。礼贤城隍庙原先在庙门对面建有戏台，两侧建有供妇女、小孩看戏的酒楼（男人在台底下看戏）。这部分建筑今天已经不存在，据说是在“二战”中被流窜到当地的日本军放火烧毁。由于没有戏台，现在每年的庙会活动，只有锣鼓班子边吹边唱，而缺少了台上的戏曲表演。

由此可见，节庆活动不仅少不了戏曲演出的助兴，而且节日的主体部分本身，也就像是一出戏剧。礼贤的“迎菩萨”，上演的就是传说当中的城隍爷外出巡视的故事。因为根据当地的传说，这位城隍原是朝廷敕封的四品大员，在衢州府做官期间，曾经三次出巡来到礼贤，为这里的百姓审理了不少冤案。戏中除了城隍爷和菩萨们用金身或偶像来替代之外，其余的角色比如十八罗汉、童男童女等都用真人来扮演。道具也或真或假，好比在舞台上演戏：有时候用真刀真枪，有时候也可以用木头的刀枪来替代。巡游的程序必须按照往年的旧例进行，这就意味着仪式行为的重复。如果有人在此基础上把表演者的出场先后、一言一行以及配乐设计，用文字的形式详细地记录下来，就会形成一种类似于戏剧脚本的文本，成为今后举行同类活动的文字依据。

另一方面，虽然节日的行为方式与戏剧表演十分相似，但节日却不是戏剧。二者的区别首先就在于观众与演员之间的界线不同。在戏剧表演中，观众和演员之间总是隔着一面舞台，保持一定的距离，戏中的情节好比水中月、镜中花。当然，在传统戏曲的表演中，演员和观众之间也会有互动，观众可以通过鼓掌和喝彩等形式来影响演出的进程和质量。尽管如此，二者之间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节日活动则不同，参与者一般都要